

doi:10.19920/j.cnki.jmsc.2021.08.008

国际秩序演化下的中国企业全球化^①

谢恩¹, 傅宇¹, 李垣^{1*}, 陈方若², 井润田², 鞠建东³,
李平⁴, 李新春⁵, 路江涌⁶, 武常岐⁷, 魏江⁸, 杨百寅⁹, 张玉利¹⁰

(1.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2.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3.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北京 100083; 4. 宁波诺丁汉大学, 宁波 315100; 5.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6.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7.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济南 250100; 8.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9.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10. 南开大学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随着前期国际化进程所带来的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实力对比的改变, 发达国家开始对于原有国际间分工体系、投资贸易体系以及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分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不满, 试图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和重构. 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企业在国际秩序演化条件下的全球化问题, 对形成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推动中国企业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国际化,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规划相关领域的前期专家讨论意见的基础上, 凝练形成了该领域五个未来研究方向, 并就每个方向给出了典型科学问题示例.

关键词: 国际秩序; 企业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1)08-0067-09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的中国企业在以越来越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活动之中. 1978年至2017年的40年间, 我国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提高到27.8万亿元, 增长了782倍. 近10年来, 我国企业国外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达到83.3万项, 占全球总量24%. 截至2020年, 大陆及香港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 达到124家. 中国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在资源获取、技术提升、规模增长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毫无疑问, 中国企业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贡献者.

然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 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实力对比也在发生显著变化, “东强西

弱”“东升西降”的趋势在近年来愈发凸显; 这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对于原有国际间分工体系、投资贸易体系以及国家政治影响力分布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不满. 特别是对于我国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原因, 表现出了更多的焦虑和不安. 它们一方面不断地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市场禁入, 围堵中国高科技产品;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修复经济朋友圈、加速供应链去中国化, 试图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和重构. 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对于前期经济全球化所形成长距离供应链的不信任; 长期占据领导地位的发达国家, 正试图打破当前全球化格局、改变既有国际秩序.

在大国博弈和国际秩序演进的大背景下, 大多数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① 收稿日期: 2021-03-15; 修订日期: 2021-07-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940001; 71940007; 71832009; 71732007).

通讯作者: 李垣(1961—), 男, 云南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lliyuan@tongji.edu.cn

战。从技术维度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多为资源驱动,仍然处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由于长期依赖外部市场和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从市场维度看,中国企业仍然遵循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思路,较少考虑国内外市场的协同。从全球治理的维度看,当前中国企业在全球合作系统中仍然处于被动接受规则、遵循现有国际秩序格局下制度安排的地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凸显,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活动中越来越受到所嵌入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市场话语权是中国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还需要整合风险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如何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助企业精准识别生态中潜在风险源,实时监测风险动态是中国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

在2019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2020年,习总书记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的指示为我国企业的新型国际化道路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企业需要实现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联通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加快实现创新驱动,保证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面对这一国家重大需求,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开展基于技术、市场、治理、安全等多维度,适配于新发展格局和新国际秩序的新型国际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管理学者需要在“十四五”期间,围绕国际秩序演化条件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开展深刻的理论探讨和充分的方法工具设计,从而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贡献智力支持。

1 国内外研究发展态势

企业全球化的研究,起源于前期世界全球化

过程中涌现出的大量跨国公司。传统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随着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的成熟,试图向外寻找新的市场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引发了学者们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探讨,形成了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国际化过程理论^[1]等一批经典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这些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渐进式扩张的过程、特征和成因,主要强调企业特有的优势资源是其开展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认为企业能够通过不断向东道国市场输入优势资源而获取超额收益。以最为人们熟知的OLI范式为例,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就被列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的三大基础因素之首(另外两个分别是区位优势(location)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直接沿用OLI等传统的西方发达企业国际化理论框架来解释新兴经济企业的国际化,主要聚焦于企业所拥有的稀有的、难以替代的、难以被模仿的知识和技术资源对企业国际化的驱动作用探讨,关注企业特有的优势资源所发挥的关键作用^[2-4]。但是,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快速崛起,一批新的国际化公司出现,它们呈现出与传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同的国际化特征,而原有的国际化理论难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在缺乏特有优势下的激进海外扩张行为。例如,偏好选择发达国家作为东道国,采取跨国并购等高投入的进入模式^[5]。为此,学者们开始基于新兴经济背景和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行为特征构建新的国际化的理论框架。

关于新兴经济企业国际化的理论视角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LLL模型^[6]、战略资产搜寻视角^[7]和跳板理论为代表^[8],认为新兴经济企业开展国际化行为的基本动机是从海外市场获取战略资产来弥补竞争劣势和后来者劣势。其中,LLL模型认为,Linkage(连接)-Leverage(杠杆)-Learning(学习)的过程能够帮助企业通过与海外企业建立连接,快速访问东道国资源,充分利用海外业务机会,实现对东道国知识和先进资源的学习;战略搜寻视角主要指出新兴经济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战略意图是获取海外市场中的先进技术、营销资源和管理专长等;跳板理论则将新兴经济企业的国际化作为其获取母国没有的优势资源

(技术、管理知识、品牌等)、寻求海外机会(市场、制度等)以实现追赶战略的“跳板”。

另一类则基于制度视角,以制度促进和制度逃离两种观点为代表,认为新兴经济企业国际化是对母国制度和市场约束的响应;既可能是响应母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也可能是对母国环境的逃离。其中,支持制度促进观点的学者指出,新兴经济政府能够为某些企业(尤其是国企)提供政策支持和政治保护,强化企业资源、降低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从而促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5, 9, 10]。而支持制度逃离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由于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政府干预力度大、地方保护主义浓厚等问题,新兴经济企业可能通过国际化来逃离母国的制度性约束^[11-13]。

这些研究帮助更好地解读了企业全球化行为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表现。然而,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特殊性也逐渐凸显。例如,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演化路径大多呈现出快速的、跨越式的特点;国际化的全球背景能帮助中国企业比过去几十年更快地国际化^[14];政府创造的优势与中国的自然禀赋相辅相成,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跨越式优势让后发的中国企业可以在能耗行业和一些朝阳行业获得竞争优势^[15]。为此,有学者指出,进一步理解什么是中国跨国企业的“中国特色”,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的行为^[15]。

然而直到21世纪初,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还是很少。世界的注意力仍然牢牢地集中在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战略,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及其对加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影响等研究问题上^[14]。即使早期存在一些关于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研究,也仅限于描述中国企业开始国际化的背景,以及它们在哪里进行冒险。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和成果的不断丰富,中国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逐渐被国际学者所关注和探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

近10年来,国际商务顶级期刊 *JIB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共发表89篇关于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发文数量基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有7篇研究成为了该领域的ESI高

被引论文,这些论文主要研究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特征、动因、战略决策等主题,大部分基于制度理论探讨了中国政府以及国有股权对企业国际化的相关影响。其中, Buckley, Clegg 等人深入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偏好高风险地区、扩张速度快、偏好远距离市场、偏好并购等高投入进入模式、缺少企业专有优势等主要特征^[16]。Luo, Gaur, Cui, Meyer 等人分别基于跳板理论从海外资源获取的视角,基于制度理论从母国的支持性和母国不便利性、国有股权比例等方面探究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因素^[17-20]。Buckley, Doh 等人指出当前学者关注并解决的国际商务领域的三方面“大问题”(big questions),主要包括解释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的出现和战略,探索离岸外包的增长、原因和后果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以及了解跨国公司如何在其全球业务中应对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压力^[21]。

国内学者对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并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逐渐变得丰满有力的。早期,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的成功获得了中国学者和企业家的关注,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国际化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标中国企业^[22-25],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找到更多的路径和依据。加入WTO后,大量中国企业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西方经典国际化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国内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也从单纯探究动机、战略影响,发展到全面研究企业内外部各类因素对企业国际化行为、效果等的影响上。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在国际化对企业绩效影响上表现不同^[26],并且大量中国数据在UTD-24和FT-45期刊中被运用于研究^[27],越来越多学者呼吁中国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管理理论^[28],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母国要素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这包括以国有股权、国有企业为主要特征的正式制度,以及包含“关系”、政治关联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非正式制度。同时,一批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为研究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跨国治理、海外并购、绿地投资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例如,围绕吉利、万向等企业“蛇吞象”式的逆向并购引发的组织合法性^[29, 30]以及并购后整合^[31, 32]的研究,为中国企业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然而,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还是面向新兴经济企业理论,或是2018年前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都是基于原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背景之下开展的分析和讨论,忽视了国际秩序正在演化这一客观背景。事实上,国内外的学者、研究人员以及政府部门,早已对国际秩序的演化给出了重要的推测。2016年,美国兰德公司在其发表的名为《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的报告中曾做出预测:在未来几年,由于某些大国的兴起、经济危机的波动以及增长缓慢和不公平加剧等风险的出现,原有的建立在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国际秩序会受到挑战和动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国际力量对比将发生深刻的调整。而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剧了国际秩序的演进,世界进入了动荡的变革时期。截至目前,以“international order”为主题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进行搜索,自2016年以来约有837篇研究探讨了国际秩序,仅2018年发文数就达到了201篇。其中,8篇ESI高被引论文均提到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或“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将发生改变,甚至有5篇或明示或暗指中国将成为新国际秩序下的唯一或多个中心之一。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秩序,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产业链回迁和本国产业保护等。发达国家这一系列行为被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解读为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去全球化浪潮兴起,众多跨国公司加大对国内市场开拓,通过逆向国际化战略谋求转型发展^[33]。对于逆向国际化的研究,目前主要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基于“退出”视角将逆向国际化视为传统国际化的反向过程或反方向活动,是一种减少国际业务的路径转移战略;二是基于“回流”视角探究企业主动地国际化回归,包括生产地回迁、供应链回迁、营销渠道回迁等多种形式^[34]。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方面,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已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其动态复杂的表现形式,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当前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其潜在机制,缺乏定量分析

的佐证。目前学界对于国际秩序演化下跨国企业回归母国市场的后续表现以及影响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揭示。

在激变的国际局势和全球疫情的冲击下,已有的国际化研究结论已无法完全解释和引领中国企业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国际化进程。首先,当前基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全球创新链的演化模式与内在机制无法充分解释中国企业的国际创新链构建。针对中国企业基于研发国际化的国际创新链构建在宏观层面上的描述尚不完全,当前研究仍囿于少数几个案例分析。从创新战略视角看,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增强和对发达国家企业依赖的减少,中国企业在逆全球化形势下如何与当地研发机构、当地企业等创新主体更好地创新合作,其构建国际创新链的战略导向、战略调整变革与内在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其次,当前基于发达国家构建并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并不能解释新的国际秩序下的由后发国家主导的全球合作治理问题,尤其对后发国家企业主导国际化的理论内涵和外延、实现路径、外部条件影响等研究严重不足。第三,前期研究强调层级结构、法律契约与价格机制是全球合作关系治理的途径^[35],针对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框架对全球合作行为产生的激励、约束、引导作用缺乏足够重视,无法涵盖国际秩序演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之外新的成本和风险(如政治成本与国家安全)^[19]。最后,现有文献对企业新型国际化中风险的智能识别与管控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很难为智能化风险防控和管理优化提供有效指导。特别是当前文献对风险识别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一般规律和情境探索^[36, 37],较少探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风险识别中的作用。同时,过往研究多基于单一背景下单一风险的扩散研究,较少分析智能技术在新型国际化风险扩散中的作用,如数字技术应用所导致的风险扩散的快速裂变和演进性。

尽管中国企业国际化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推动高水平的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与美国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政策相反,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十四五”期间加快部署国际秩序演进条件下的中国企

业国际化研究,不仅有望为我国决策层和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决策借鉴,同时也有望帮助我国管理学者实现在企业国际化理论领域的引领地位,从而强化我国未来在经济全球化领域的话语权优势。

2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典型科学问题

2.1 国际秩序演化条件下的国际商务新理论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产业组织、关系网络、企业资源等角度基于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战略和活动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多个国际商务理论范式和流派。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建立在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之上,强调充分利用各区域在效率和禀赋的差异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而忽略了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框架对国际商务活动可能产生的激励-约束-引导作用。面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巨大演变,现有国际商务理论的基本假定受到了挑战。以往理论关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尤其是严重忽视国际化所带来有关多元资源与独特机会的交易价值^[38],已无法涵盖国际秩序演化带来的新挑战(如政治成本和国家干预风险)与新机遇(如数字化转型提升全球创新体系与价值链优化)。因此,已有理论难以对企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球化战略做出有效解释与判断,更不能有效指导我国企业面对国际秩序演化有效推进自身全球化战略。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国际秩序演化所带来的新的成本类型;新的价值创造机会和新型风险;企业国际战略形成的基本因素和新分析框架;新的国际商务理论构架和体系等。

2.2 国际秩序演进与中国企业全球合作网络生态重构

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正试图通过改变国际秩序将我国企业从其主导的价值体系和技术体系当中孤立和排斥出去。在这一去中国化背景下,要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在国际秩序演进条件下实现全球化,就必须重点讨论如何重新构建自身全球化合作的生态体系。以往研究主要从西方企业视角讨论了如何构建和治理各类合作关系的问题。尽管

已有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企业国际化研究根植于特定的情境和条件假设,这些研究成果很难回答我国企业如何在新的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之下构建自身的全球网络生态的问题。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全球合作生态来协同国内、国际市场的资源、信息、知识等要素仍是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中国企业的特征以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特征下的企业合作网络生态及价值整合理论;生态体系构建的策略和治理机制;合作网络生态间竞争动态与演化;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嵌入特征及其演进;跨文化管理与合作网络生态等。

2.3 国际秩序演进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组织变革

国际秩序的演化将对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造成冲击。例如,从地理分布的视角看,部分发达国家可能会限制中国企业对其市场的进入;从技术发展的路径看,中国企业可能会被隔离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体系之外,遭遇技术封锁。在推进全球化的战略过程中,中国企业还将面对更多的国际政治干预风险。一方面,由于企业与主权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的目标始终是获得超额利润,因而可能无法迎合母国的潜在目标;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某种程度上也会挤压东道国及其本土企业经济利益,因而可能面临来自当地政府的打压。在这种情境下,企业自身的合法性易受到双方质疑,进而需要承受来自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压力。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国际秩序与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选择及实施路径(例如海外并购);国际秩序演化与中国企业全球化扩张的时机选择、海外市场选择与新型进入方式;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当中的合法性构建策略;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与本土化策略;空间-产业链-价值链布局与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组织变革等。

2.4 国际秩序演进下的中国企业产业链布局与运营转型

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原有的全球产业链稳定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当

前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布形态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一方面,前期国际化导致的全球效率和成本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有分工体系难以持续。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在颠覆以往的产业结构,推动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与此同时,疫情的爆发和持续流行,使得国际市场萎缩风险进一步加大;快速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割裂状态,严重影响了企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稳定性。这些变化叠加国际政治秩序以及世界各国对于经济全球化认知的调整,共同导致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转型。为此,需要探讨全球产业格局变迁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该如何重新调整产业链布局,进而解决运营转型的问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企业供应链的布局调整;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与产业链布局(例如数字化生态);企业海外业务运营方式转变及其风险;海外业务的市场布局策略、运营与政治风险规避等。

2.5 国际秩序演化条件下的中国企业全球创新战略重构

应对国际秩序演化对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所造成的挑战,核心在于如何推动我国企业利用全球化的条件实现有效创新。由于长期依赖外部市场和国外技术,我国企业一直缺乏自主可控的领先技术。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长期没有彻底解决,导致中国企业被牢牢封锁在核心技术之外,从事低附加值、高消耗的劳动分工,无法在国际生产分工中进一步提高价值链的位置;这不仅制约着许多产业的升级,也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和竞争力提升,其对发达国家企业依赖减少,双方在构建国际创新网络中的资源和权力平衡被打破,新的国际化

竞争和威胁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逆全球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企业在构建创新网络、与东道国研发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更好地创新合作等方面的战略导向、战略变革调整和内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国际秩序演化的典型事件对企业创新网络和技术来源的冲击效应;国际秩序演化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选择;中国企业全球创新网络的构建与治理策略;国际秩序演化条件下的技术获取与整合策略及其风险;政府-市场力量协同与企业创新网络构建;国际秩序演化与企业创新网络的稳定性与韧性;企业数字化与全球创新战略选择等。

3 结束语

随着前期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变化,发达国家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压力,正试图打破原有国际秩序,主导并制定新的秩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动荡的国际秩序下如何进行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将广泛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构建中国新型国际化理论,逐步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深化企业国际化特征和机理的理论研究,以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创新驱动、治理完善、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协同主导国际化进程为研究重点,广泛获取企业国际化相关的创新、市场、治理等数据,探索企业国际化安全保障方法和决策支持系统,服务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管理实践。

参 考 文 献:

- [1] Jonhanson J, Vahlne J 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 8(1): 23-32.
- [2] Kundu S K, Katz J A. Born-international SMEs: BI-level impacts of resources and intention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3, 20(1): 25-47.
- [3] Yiu D W, Lau C, Bruton G D. International venturing by emerging economy firms: The effects of firm capabilities, home country networks,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519-540.
- [4] 毛蕴诗, 汪建成. 日本在华跨国公司竞争地位与竞争优势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05, 8(3): 90-96.

- Mao Yunshi, Wang Jiancheng. Study of competitive posi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Japanese MNCs' subsidiar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05, 8(3): 90–96. (in Chinese)
- [5]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6] Mathews J A.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 firm: A resource-based account of industrial catch-up strategie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4): 467–488.
- [7] Rui H, Yip G S. Foreign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 A strategic intent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8, 43(2): 213–226.
- [8] Luo Y, Tung R 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81–498.
- [9] Nuruzzaman N, Singh D, Gaur A S. Institutional support, hazard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20, 10: 361–385.
- [10] Wang C, Hong J, Kafouros M, et al. Explor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outward FDI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7): 655–676.
- [11] Xia J, Ma X, Lu J W, et 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emerging market firms: A resource dependence logic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9): 1343–1363.
- [12] Shi W, Sun S L, Yan D, et al. Institutional fragility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 48(4): 452–476.
- [13] Mariotti S, Marzano R. Relational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en and how are multinational co-owners a plus? [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20, 10: 779–812.
- [14] 李自杰, 刘畅, 李刚. 新兴国家企业持续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驱动[J]. *管理科学学报*, 2014, 17(7): 35–49.
- Li Zijie, Liu Chang, Li Gang. Experiential drivers of sequential FDI entry modes in emerging economy firm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4, 17(7): 35–49. (in Chinese)
- [15] Ramamurti R, Hillemann J. What is “Chinese” about Chinese multinational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 34–48.
- [16] Buckley P J, Clegg L J, Voss H, et al. A retrospective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1): 4–23.
- [17] Luo Y, Tung R L. A general theory of springboard MN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2): 129–152.
- [18] Gaur A S, Ma X, Ding Z. Home country supportiveness, unfavorableness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3): 324–345.
- [19] Cui L, Jiang F. State ownership effect on firms' FDI ownership decisions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investing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3): 264–284.
- [20] Meyer K E, Ding Y, Li J, et al. Overcoming distrust: How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dapt their foreign entries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broa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4, 45(8): 1005–1028.
- [21] Buckley P J, Doh J P, Benischke M H. Towards a renaissa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Big questions, grand challenges, and the future of IB scholar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 48(9): 1045–1064.
- [22] 杨德林, 陈春宝. 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 1997, (2): 33–39.
- Yang Delin, Chen Chunbao.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enterprises[J]. *China Soft Science*, 1997, (2): 33–39. (in Chinese)
- [23] 林梅, 蓝海林. 战略学习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借鉴[J]. *经济管理*, 2005, (17): 38–40.
- Lin Mei, Lan Hailin. Strategic learning and the refere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J]. *Business Man-*

- agement Journal, 2005, (17): 38–40. (in Chinese)
- [24] 毛蕴诗, 汪建成. 在华跨国公司战略选择与经营策略问题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09, 12(2): 117–125.
Mao Yunshi, Wang Jiancheng. Study on strategy and tactics selection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09, 12(2): 117–135. (in Chinese)
- [25] 刘 斌, 崔文田, 辛春林. 海外市场的在线生产策略选择及其竞争策略[J]. 管理科学学报, 2010, (3): 8–18.
Liu Bin, Cui Wentian, Xin Chunlin.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online choice of foreign production strateg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0, (3): 8–18. (in Chinese)
- [26] 范建亭, 刘 勇. 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中外企业的差异——来自 500 强企业的经验证据[J]. 管理科学学报, 2018, 21(6): 110–126.
Fan Jianting, Liu Yong. Comparis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500 and Global 500[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8, 21(6): 110–126. (in Chinese)
- [27] 陈宇新, 张 喆, 杨涵方. 基于中国数据的国际管理研究学术进展——基于 UTD-24 和 FT-45 的可视化分析[J]. 管理科学学报, 2018, 21(11): 61–75.
Chen Yuxin, Zhang Zhe, Yang Hanfang.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with China data source: An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ations in UTD-24 and FT-45 journals with data visualiz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8, 21(11): 61–75. (in Chinese)
- [28] 张玉利, 吴 刚. 新中国 70 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2019, 35(11): 8–18.
Zhang Yuli, Wu Gang.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cientific cours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70 years of new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11): 8–18. (in Chinese)
- [29] 魏 江, 王 丁, 刘 洋. 来源国劣势与合法化战略——新兴经济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 36(3): 101–120.
Wei Jiang, Wang Ding, Liu Yang. Disadvantages of original country and legitimacy strategies: Case studies on EMNEs' cross-border M & A[J].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3): 101–120. (in Chinese)
- [30] 杜 健, 郑秋霞, 郭 斌. 坚持独立或寻求依赖? “蛇吞象”式跨国并购的整合策略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6): 16–26.
Du Jian, Zheng Qiuxia, Guo Bin. Insisting on independence or seeking for dependence? The research on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strategy for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from emerg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20, 23(6): 16–26. (in Chinese)
- [31] 程 聪.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组织整合制度逻辑变革研究: 混合逻辑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20, 36(12): 127–145.
Cheng Cong.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log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rm's organization intergration after cross-border M&A: Based on hybrid logic[J].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12): 127–145. (in Chinese)
- [32] 杨 勃, 许 晖. 企业逆向跨国并购后的组织身份管理模式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 174–192.
Yang Bo, Xu Hui.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management model after reverse cross-border M&As of enterprise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0, (1): 174–192. (in Chinese)
- [33] Chin T, Liu R H, Yang X. “Rever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ese firms: A study of how global startup OEMs seek to compete domestically[J].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016, 22(2): 201–219.
- [34] Kinkel S. Trends in production relocation and backshoring activ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12, 32(5–6): 1572–1579.
- [35] Contractor F J. The world economy will need even more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2021 dec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1: 1–16.
- [36] Shang Y, Dunson D, Song J S. Exploiting big data in logistics risk assessment via Bayesian nonparametrics[J]. Operations Research, 2017, 65(6): 1574–1588.
- [37] Olsson R. In search of opportunity management: Is the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enoug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

ject Management, 2007, 25(8): 745 – 752.

[38] Li Y, Li P P, Liu Y, et al. Learning trajectory in offshore OEM cooperation: Transaction value for local suppliers in the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2010, 28: 269 – 282.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XIE En*¹, *FU Yu*¹, *LI Yuan*^{1*}, *CHEN Fang-ruo*², *JING Run-tian*², *JU Jian-dong*³, *LI Ping*⁴, *LI Xin-chun*⁵, *LU Jiang-yong*⁶, *WU Chang-qi*⁷, *WEI Jiang*⁸, *YANG Bai-yin*⁹, *ZHANG Yu-li*¹⁰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3. PBC School of Fi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4.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0, China;
5.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6.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7.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8.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9.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10.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ength among countr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egan to have more and more doubts and dissatisfaction about the original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investment, trade system and national political influence. They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featuring dual circulation, in which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reinforce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and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new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uilding on the expert panel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the Management Science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his paper summarizes five promising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and presents the representative scientific questions for each direc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ization of enterpris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